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SERIES

1948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主编 / 刘硕良

四个四重奏

〔英国〕托·斯·艾略特

(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裘小龙等译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SERIES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主编/刘硕良

四个四重奏

〔英国〕托·斯·艾略特
(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裘小龙等译

漓江出版社

(桂)新登字03号

·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

四个四重奏

[英国]托·艾略特

[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裘小龙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上海新华书店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11.875印张 插页6 260千字

1985年9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2版第4次印刷

印数23201-26500册

ISBN 7-5407-0733-0

I·516

定价：平装 8.40元
彩盒精装 14.90元



[美国] 托·艾略特 (1888—1965)

(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新时期有数的宏伟工程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序

刘硕良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的译介，不自今日始。早在二三十年代，一些获奖作家的作品就介绍到中国来了。我们久已熟知的文学名著，如《约翰·克利斯朵夫》、《静静的顿河》、《布登勃洛克一家》等等，都是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代表作。不过，以往这些译介都没有特别着眼于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一角度，甚或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它，而且所介绍的数量有限，大部分获奖作家还不为中国读者所知晓。

适应改革开放大潮推出的这套壮观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不同以往的零散译介。它以系统介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为己任，凡是这个头号国际文学大奖的得主，都要尽量为之单独选出1卷，体裁不限，长短不拘；每卷均有译序和授奖词、誓词、生平年表、著作目录，力求给读者提供一个能真实地反映诺贝尔文学奖及其每一得主的风貌的较好版本。不仅过去译过的获奖作家的若干名著要适当选入本丛书，更要深入地介绍许多尚无译文、尚未在中国展露其庐山真面目的获奖作家的代表作。即使过去已有译介的作品，收入本丛书后，译文作了更新或校订，并增加了前言、附录，其译介的深度和精确度也已胜于旧译。

为什么要如此兴师动众，有计划有系统地出版这么一套大

型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呢？当1982年丛书头4种问世时，就有人表示过怀疑。随着社会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丛书各卷的陆续推出，随着人们视野的逐步开阔，在经历过从简单否定到一味推崇两个极端之后，对诺贝尔文学奖持客观的有分析的科学态度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这套丛书的价值和作用也已为文学界、新闻出版界和越来越多的读者所确认了。但人们的认识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直至今日，仍然有人不很理解：“诺贝尔文学奖不是资产阶级的吗？不是带有地域和政治偏见的吗？为什么我们要以它为标准来划线呢？……”为了更清楚地说明丛书的出版意图，回答关心它的同志的疑问，趁丛书加快出版进度、力争两三年出齐90卷，并采用统一的封面设计，各卷逐步纳入新的外形框架的机会，增写了这篇总序，谈谈这套丛书的缘起和设想，以进一步和广大读者沟通，并就教于各地方家。

* *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1978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长沙召开，首次确定了地方出版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涉足外国文学领域的出版社很快由两三家增加到几十家。1980年冬才挂牌的漓江出版社面对并起的群雄，面对人民文学、上海译文两家最具权威的老牌出版社，感到要在众山夹峙的缝隙中走出一条生路来，非另辟蹊径不可。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推出了以《保尔和薇吉妮》、《白夜》、《巴黎的忧郁》开头的小开本“外国文学名著”系列，也正是基于要自成特色、要开拓新领域、要出一批名著而又少复以至不重复“人文”、“译文”足印的考虑，当郑克鲁和金子信两位先生1981年联合建议推出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时，我们很快就接受了。

不错，文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文学奖的颁发往往会和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相联系。诺贝尔文学奖既生发于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烙印。意识形态的不同，价值观念的不同，常常导致人们对文艺作品及其评奖工作的认识上的歧异。大家看到，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的评选，物理奖、化学奖、医学奖的得主，一般都众望所归，极少异议，而文学奖就比较麻烦，不时会引

起这样那样的诘责和批评。是不是一有非议就证明评委们评错了呢？恐怕还不能这么看。文学作品的特性本来就容易使它人言言殊，不像自然科学成果那样有比较统一的、公认的、可以量化的鉴评标准，加之诺贝尔文学奖本身虽以张扬“理想主义”相要求，实际衡量和掌握时却有很大的选择空间，外人无从得知其内幕详情——即使是评委也不得透露近50年的有关档案，所以，在批评意见和评奖理由之间有时很难逐情直遂地作出谁是谁非的判断。但抛开这些因素不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工作主观上存在某种局限，有时囿于视野或偏见，以致较次要的作家获奖，更显要得多的作家却名落孙山的情况，是确实有过的。

以地域来说。诺贝尔文学奖从1901年开始颁发，到1991年止，中间有7年因战争未授奖，有4年每年授予2位作家，实际得奖作家共有88位（萨特未领奖）。他们分布在5大洲30个国家，而主要集中于欧美，其中法国12人，美国9人，英国8人，瑞典7人，德国6人，意大利5人，西班牙5人，俄苏4人，挪威、丹麦、波兰各3人，爱尔兰、瑞士、智利、希腊各2人，比利时、南斯拉夫、捷克、冰岛、芬兰、以色列、尼日利亚、埃及、南非、印度、日本、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墨西哥、澳大利亚等15国各1人。尽管评委会近几年第一次颁奖给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优秀作家，受到舆论的广泛好评，人们仍然觉得还有一些地区和国家的杰出作家理应更早更多地进入获奖行列。就拿亚洲来说，获奖作家迄今仅有2位，而北欧却有12位，悬殊如此之大，无论就各该地区的文学状况或就其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来说，都未必与实际相副。造成这种悬殊显然不单纯是亚洲文学翻译介绍少所能解释得通的。

以作家来说。一方面，托尔斯泰、博尔赫斯这样一些文学大师未能获奖，总使人不免有遗珠之感（受损害的决不会是这些大师本人），特别是拿他们和某些获奖作家的实际成就与历史作用相比较，更让人难以理解评奖的天平究竟是怎样倾斜的。另一方面，某些对社会主义持反对态度的作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流亡作家得奖，除了他们文学上的业绩外，明眼人都不难看出其中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不然为什么不授给那些文学成就显然更高而思想比较进步或者比较持中的著名作家呢。

凡此种种，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缺陷和不足。其实，任何文

学奖的颁发都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和侧重角度，都受一定的价值观念和取向的制约，不可能十全十美、皆大欢喜。我们无意苛求诺贝尔文学奖，要它绝对公正，完美无缺；指出诺贝尔文学奖的局限，只是要如实地对它加以评价，不盲目地把它看得至高无上，不唯“诺贝尔”马首是瞻，不患“诺贝尔情结”。对任何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及其获奖作家作品在内，我们都应该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独立的评判。盲目崇拜是最没有出息的。

明乎此，我们还要出版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我想至少有三层考虑：

一、诺贝尔文学奖毕竟奖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杰出作家，他们的优异产品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和人类共同财富的一部分，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和借鉴。许多举世公认的名家，如罗曼·罗兰、法朗士、莫里亚克、纪德、萨特、加缪、奥尼尔、福克纳、海明威、吉卜林、肖伯纳、叶芝、艾略特、贝凯特、托马斯·曼、黑塞、伯尔、肖洛霍夫、皮兰德娄、显克维奇、阿斯图里亚斯、聂鲁达、马尔克斯、帕斯、塞拉、拉格洛夫、汉姆生、泰戈尔、川端康成、索因卡、马哈福兹、戈迪默……荣膺了诺贝尔文学奖桂冠，使这项大奖当之无愧地拥有不凡的品位和隆盛的声誉。有些获奖者在世界范围内影响不算很大，但在其所在国或所在地区仍然占居重要的位置。至于有些作家获奖时呼声甚高，过后则影响减退，这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说是正常的。中外文学史上都有一些作家如彗星划过天空，不能把光亮久留人间，但这并不排斥他们的价值有朝一日又可能重新得到人们的发现和承认。文学现象纷繁多变，我们很难简单地从获奖者一时声名的盛衰来断定其当年获奖是否允当。

二、诺贝尔文学奖毕竟是本世纪以来国际上最重要、最持久、最有影响的文学现象之一，它对各国各民族众多作家的吸引力是有目共睹的。这一点，即使从它有时授奖欠公而引起种种议论也能得证明——证明它为世人为文坛所普遍关注。对于这样一项大奖，这样一种幅射面宽广、渗透力深远的国际文学现象，世界各国都颇为重视，我们中国作为文学大国，理应对它有尽可能如实的客观的了解，理应在占有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对它进行科学的审视和独到的评析，如果我们不系统出版其作品，又

有什么根据对它发出这样那样的指责和议论呢!

三、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不等于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这个大奖和所有获奖者及其作品。如前所述,获奖的不见得完全处于同一水平线上,未获奖的并不因此而贬损其价值。我们组编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无非是在新时期改革开放潮流的促动下,从新的角度多开一扇窗口,对北京、上海已出的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和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起一点补充配合的作用,丝毫没有以诺贝尔文学奖为标准来对外国文学作品划线的意思,当然也就谈不上以它来识鉴和取舍所有外国文学作品了。即从漓江出版社来说,我们在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的同时,还推出了一系列其他外国文学名著和《法国20世纪文学丛书》、《域外诗丛》等众多的外国文学作品,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尽管如此,作为新时期我国翻译界出版界一项有数的宏伟工程,《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仍以它新颖的角度、诱人的色彩,受到了广大文学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的欢迎和关注,得到了社会多方面的支持和鼓励。全国“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包括了这套丛书。在新闻出版署主办的首届(1980—1990)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评奖中,这套丛书有3种——福克纳卷《我弥留之际》、莫里亚克卷《爱的荒漠》、阿斯图里亚斯卷《玉米人》同获一等奖,占一等奖图书总数19种的15%。许多作家赞扬和购藏这套丛书,一次邮寄数十元、上百元到书店、出版社成批购买的不在少数。历届全国书市和在香港主办的中国书展,都把这套书作为重点陈列的展品。新华社多次用中文向国内外播发丛书出版消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解放日报、文汇报、《读书》、《世界文学》、《中国翻译》等大报刊以及中央电视台、国际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多次介绍这套丛书。唐弢、李文俊、彭燕郊等知名作家都撰写过评论。丛书的影响甚至越过了国界,一些国外人士将这套丛书的发行,视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重视洋为中用、对诺贝尔文学奖持郑重态度的一个标志。瑞典诺贝尔图书馆收藏了丛书精装本,文学奖两位评委会见过丛书主编,谢尔·埃斯普马克教授并专程访问了漓江出版社,瑞典驻华大使馆和瑞典有关机构还在提供版本等方面给予了友好的帮助。丛书的出版无疑有利于文化交流,也有利于瑞

典皇家学院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文学。

*

*

*

出版大型丛书，通常会有一个庞大的编委会，而编委会真正起作用的未必很多。《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的出版，不仅在书的内容和形式上有所开拓，在书稿组织上也希望做点新的尝试：不重名而贵实，一切以质量为依据，以实效为依据。

首先确定总的构想和框架：在研究的基础上翻译，翻译与研究相结合，力求使每一卷成为了解该作家的优良选本并起一定的向导作用。这个总目标主要是通过四个方面的工作来实现的——

一、篇目：由于诺贝尔文学奖绝大多数是表彰某一作家的整体创作而不特指其某部作品，译本选目必须从授奖词中提名赞扬的作品和史家公认的作品中挑选，首先侧重其代表性和影响力，保证选目的权威，同时适当顾及篇幅、可读、整体平衡和少与其他译本重复等因素。

二、译文：尽量从原语种较好的版本直接移译，即使是译者寥寥可数的小语种作品仍绝大部分译自第一原著。由于组稿困难，个别需要转译的，或采用原著者自己翻译或认可的译本，或设法以原书进行参校，力求忠于原文，接近原文。译作以新译为主，少数旧译在收入丛书时作了必要的校订。希望较多地保持丛书的新鲜感，并传留一部分已有定评的佳译。

三、前言：务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作家作品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评论。强调占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融入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只要言之有物，决不吝惜篇幅。福克纳卷的译序就长达4万余言，等于一本出色的福克纳导读或研究福克纳的入门小册子。

四、附录：尽量收齐授奖词、答词、重要访谈录和生平年表等有关配件，给读者提供较多的信息，提供据以作出自己评判的原始材料。这部分文字名为附录，实乃凤尾，读者对它的兴趣决不在正文之下，而且不可不读。

我们设想通过这些安排，在各卷有限的篇幅内扩充容量，提高质量，并共同形成特色，树立整体优势，不独使我国首次译介

的作家作品引人注目，即使我国介绍过的作家作品也能显示出新的翻译水平和出版水平，让购置了其他版本的读者仍然会对诺贝尔丛书中的新版本发生兴趣。

总的框架和构想确定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遴选和延请对获奖作家研究有素并能胜任译撰工作的专家来主持各卷译事：提出选目，组织翻译，撰写前言，辑录附件。这些工作有的由主持者一以贯之，有的则由他组织同道合力进行而最后总其成。实践证明，各卷主事人选准了，工作做到家了，整个丛书的质量就有了最基本的保证。

值得庆幸的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名气和中國知识分子赤诚的事业心使我们顺利地得到了语种齐全、实力强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以及北京、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广州等地许多专家的大力支持，先后共襄此一盛举的老中青优秀翻译工作者多达200余人。像董衡巽、冯亦代、赵少伟、吴劳译海明威，李文俊、陶洁译福克纳，巫宁坤译斯坦贝克，施咸荣译贝凯特，柳鸣九译萨特，罗新璋译纪德，桂裕芳译莫里亚克，林秀清译西蒙，高年生译伯尔，刘习良译阿斯图里亚斯，吕同六译皮兰德娄，力冈译肖洛霍夫，高慧勤译川端康成，李野光译埃利蒂斯，林洪亮译显克维奇，绿原译米沃什，文美惠译吉卜林，杨武能译海泽，郑克鲁译杜伽尔，郭宏安译加缪，章国锋译豪普特曼，王逢振译赛珍珠，吴岳添译法朗士，倪培耕译泰戈尔，邵殿生译索因卡，裘小龙译艾略特，刘星灿译赛费尔特，申慧辉译肖伯纳，黄梅译高尔斯华绥，石琴娥译拉格洛夫，李之义译海顿斯坦姆，林桦译延森，朱炯强译怀特，宋兆霖译贝娄，荒芜、汪义群译奥尼尔，潘庆龄译路易斯……都可说是恰当其人，有些人选甚至是国内再好不过的人选。他们长期研究所译的作家，熟悉其全部作品和风格，了解外界有关的评论，自然最有条件选准篇目、把握译文，也最有条件写出高水平的前言来。

*

*

*

丛书起初是分辑出版的，每辑各书在年代、国家、体裁上稍加搭配并有框架统一的封面，但辑与辑之间年代交叉，封面各异，读者保存和查找感到有些不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特邀著

名装帧设计家陶雪华女士统一进行整套丛书的设计,各卷封面统一,书脊上标明获奖年份,便于读者按年代先后排放。平、精装本均有前后环衬、作家肖像和丛书总序、总目,精装本还增加了彩印函套。过去已出的各卷,重印时将统一调整,个别卷为两位作家合出的也将单独分开。预计到1993年,如果还有两位作家获奖,丛书就将恰好排满90卷,以后新增1位增出1卷,《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这项系统工程也就大功告成并能不断增加活力了。

与丛书配合印行的还有正在编辑的《诺贝尔文学奖词典》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回顾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著作以及分类选本等。相信丛书出到八九十卷以至上百卷并有各类相关产品相继问世时,一座座华美的文学殿堂将吸引更多的读者一道跨入充满希望的21世纪的壮丽征程。

衷心感谢译者、读者和社内外同仁的携手合作!

衷心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指教!

1991年12月26日

陶雪华于桂林

· 译本前言 ·

开一代诗风

裘小龙

托玛斯·史特恩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 1888—1965), 现代英美诗歌中开创一代诗风的先驱, 一九四八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是个极有影响的现代派诗人、评论家和剧作家。早在三十年代, 我国已有他代表作《荒原》的译文, 但总的说来, 我们对他的翻译和研究还是初步的, 不足的。

艾略特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艾略特的祖父在那里创建了华盛顿大学。艾略特的父亲是个殷实的商人, 母亲夏绿蒂·史特恩斯也来自新英格兰的名门; 艾略特是他们的第七个孩子。

在一个富有文化修养的家庭里, 艾略特度过了他的童年。他后来的诗篇不时闪烁着孩提时代的记忆。他家当时在马萨诸塞州有一座避暑的别墅; 临海眺望, 风光迷人, 难忘的景色多少年后溶进了他的诗行: “从宽敞的窗户通向花岗岩的海洋/白色的船帆依然飞向海的远方, 海的远方/不能折断的翅膀。”自然, 诗是象征性的。

· 译本前言 ·

还在中学时代，艾略特就悄悄练着写诗。他早年的一些诗，六十年代末才在《诗和戏剧全集》中发表，明显地充满了浪漫派色彩。

一九〇六年，艾略特进入哈佛大学，专修哲学。他的兴趣很广，除哲学外，还选学了法文、德文、拉丁文、希腊文、中世纪历史、比较文学，甚至东方哲学和宗教等。在大学时期，他的导师中有著名的新人文主义者欧文·巴比特和美学家桑塔扬那。接着是研究生课程。一九一〇——一九一一年，他去法国巴黎大学学哲学和文学。同年十月，他回到哈佛，潜心研究新黑格尔主义者布拉德雷的著作。一九一四年，他以客座研究员资格去德国，不久赴英国牛津大学，撰写博士论文《经验和知识的目的：布拉德雷的哲学》。论文完成后，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潜艇对海上船只滥施袭击，他不能回美国参加论文答辩而没有获得学位。

一直到了六十年代，他那篇论文只是作为一位著名诗人的小古董才得以印行。不过布拉德雷的一系列哲学著作确实对艾略特的诗创作起了深远的影响。按照布拉德雷的观点，人（个性）只是不完美性和幻象的堆砌，感官所能感受到的只是事物的形式，缺乏统一；而人的心灵间互相隔阂，思维和存在并不一致。这与浪漫主义传统中诗人作为认识一切的先知的概念是截然相反的。

艾略特在攻读哲学的岁月里，仍一直进行着诗创作。一九〇八年十二月，艾略特阅读了阿瑟·赛蒙斯的《文学中的象征主义运动》一书，接触到法国后期象征主义者儒尔·拉福格（1861——1915）的作品。拉福格的作品给了艾略特猛烈的冲击，“导致了他与维多利亚时代英美诗歌的文质彬彬的传统彻

底决裂。”^①

一九一四年，艾略特在伦敦与当时已成名的庞德第一次相遇。翌年，庞德以《诗刊》海外编委的身份力争，坚持要在现代诗的这一主要阵地上发表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后又陆续发表了收入一九一七年《诗选》的其他几首诗。

这期间艾略特个人生活中的变化，也使他的诗创作起了些变化。一九一五年，他和英国姑娘维芬·海涅特结婚。维芬聪颖、活泼，是艾略特最早的崇拜者和支持者之一，但她的体质娇弱，经常苦于神经衰弱，为他们的家庭生活添上了阴影。艾略特羁留英国，只能在一间中学任教，年薪仅一百四十镑，因此常为生计焦虑。“我常常感到《情歌》是我的天鹅之歌，但我从不对人提，因为维芬十分渴望我能写出一篇可与《情歌》媲美的诗，而我如果做不到，她会万分失望的……从某种角度看，这一年充满了人所能想象的最可怕的恶梦般焦虑。”^②

一九一七年，艾略特转入罗厄茨银行工作；同年加入《利己主义者》杂志编辑部。第一次世界大战渐渐暴露的残酷性和非正义性更给艾略特精神世界涂上悲观和怀疑的色彩。“每个人的个人生活都被这场巨大的悲剧所吞没，人们几乎不再有什么个人经验或感情了”，艾略特在一封信里这样写着。一九一九年，艾略特的第一部文学评论集《圣林》出版。然而，艾略特的经济状况依然不见改善，庞德和美国的一名著名的艺术资助者约翰·奎因曾筹划秘密地给艾略特一笔款子，使他能专心致志创作，但他们的努力未取得成功。到了一九二一年，维芬的

① 戴维·帕金斯：《现代诗史》，哈佛大学版，1976年，第376页。

② 托·史·艾略特：《荒原，原稿的影印和誊写本》，费边和费边出版社，1980年，第4页。

神经疾病愈发加剧，艾略特自己身心交瘁，也面临着一次精神崩溃，只得去瑞士一家疗养院。就在疗养院里，艾略特创作了《荒原》的大部分。出院后，艾略特把《荒原》的初稿交给庞德。庞德以惊人的直觉为这首长诗作了修改，删去了一半多的内容，使其得以定型。（出于对奎因的感激，艾略特曾送给他《荒原》的手稿。奎因病死后，手稿下落不明，到艾略特去世后才重见天日。）《荒原》问世，产生巨大反响，建立了艾略特在现代派诗歌中的地位。同年，他出任《准则》杂志主编，撰写很有影响的文学评论。

《荒原》是反映诗人这个时期精神危机的代表作，表达了整整一代人的幻灭。《空心人》（1924）更充满了悲观和虚无主义色彩。然而，象艾略特这样敏感的知识分子，显然又不能对生活一味绝望或幻灭就告了事，他总是要寻找一条“出路”的，或早或晚他得对社会采取某种肯定的态度。于是他的探索到了一个转折点。一九二七年他加入英国国教，并改入英国籍。一九三〇年发表的《灰星期三》，是首宗教色彩很浓的诗，标志着他诗创作的一个新阶段。在《兰斯劳特安特罗斯》的序言里，艾略特公开声称：“政治上，我是个保皇党；宗教上，我是英国教徒；文学上，我是个古典主义者。”艾略特的皈依宗教，无疑需要作具体分析，不过宗教思想影响了他以后的创作，却是毫无疑问的。三十年代后，他在诗坛的地位业已确立。一九三二年，他与已疯了的维芬分居。维芬于一九四七年在疯人院里病故。维芬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他们的婚姻也是如此。但回过头来看，一场不幸的婚姻对他诗歌创作的影响却不一定是不幸的。一九三四年他写了《岩石》的合唱诗、论文集《追随奇特的众神》，同年开始创作的《四个四重奏》，到一九四三

年才告完成。《四个四重奏》是艾略特晚期诗中的代表作，风格与早期诗迥异，反映他“成熟了”的哲学思想和世界观。一九四八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授奖的理由是：“由于他作为现代派一个披荆斩棘的先驱者的作品。”同年英国国王还向他授了劳绩勋章。

五十年代以后，艾略特很少写诗，主要从事文学评论和诗剧创作。艾略特从他的创作生涯一开始就对诗剧有很大兴趣。他说过：“诗歌的最理想形式，最能直接发挥它的社会功能的手段就是戏剧。”一九五〇年，他发表诗剧《鸡尾酒会》，一九五四年《机要秘书》、一九五九年《政界元老》接着问世。剧本和诗的成就相比是较为逊色的，虽然剧本的语言更炉火纯青了。为什么晚期剧本的成就不如早期的诗歌，这还是评论家在继续探讨的问题。问题的一个关键也许是二十世纪中诗剧形式的生命力的问题。

一九五七年，艾略特和法莱丽结婚。在一生的最后八年里，他似乎第一次在个人生活中找到了幸福。法莱丽原是他的秘书，对他的照顾无微不至。论文集《诗歌和诗人》和诗剧《政界元老》都是题辞献给她的。艾略特一九六〇年在哈佛大学的一次纪念会上曾这样说：“缺少这次幸福的婚姻的满足，无论什么样的成绩和荣誉都根本不能给我满足。”^①

晚年的艾略特身体较差，创作和社交活动都受到了影响，一九六五年在伦敦去世。

英国当代著名诗人菲力普·拉金对艾略特的生平和创作的关系曾这样说：“把那感受的人和那创造的头脑分开来是对的

^① 德尔·戈登：《艾略特的早年生涯》，牛津版，1977年，第111页。